

早早地吃过晚饭,我跟父亲、母亲出门散步。六点多钟,太阳刚刚落土,天还没有擦黑,往西的水泥路,南边左手是正在拔节的小麦,已经高过了膝盖,北边右手是油菜地,繁花渐落,露出猫须般嫩绿修长的果荚。田野中的小枫杨树,珊珊可爱,枝柯上也绽开了勃勃新芽,树下田地里布有布谷鸟在咕咕地吟咏。东南风吹在手脸上,挟着土膏与青草的厚味,已经没有了寒气,母亲穿着早上姐姐骑电动车送来的新外套,大步向前,我在中间,举着我的登山杖,防备母亲畏之如虎的乡村田园犬。父亲跟在最后,刚才喝了两大杯白酒;妹妹村里作坊酿出来的谷酒,她赞不绝口,也不敢多喝,查出糖尿病后,他戒了烟,酒还可以尝尝,但超过两小杯,就会被母亲、姐姐、妹妹一起念紧箍咒。

父亲离开乡下,移居南宁我弟弟家,已经有十五六年了,他们渐渐习惯了广西删除掉夏季与寒冬的温和气候,每年也只是在清明节前,候鸟般回来祭祖、探亲,小住半个多月,然后在绿叶成荫子满枝的谷雨天里,坐高铁回程,继续接送心爱的两个孙子上学,吃早、中、晚饭。

父亲是泥瓦匠出身,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的房子。二〇〇三年,祖父去世后,父亲亲手盖的三层楼的新房,而今也有二十年了,屋顶漏水,门窗有缝,地板砖开裂,都够他忙上好几天。然后是西边没有拆掉的一间旧瓦屋,之前是祖父、弟弟与我的卧室,外墙与屋顶上缠满了枯萎的南瓜藤与我未及摘下的老南瓜,他忙着扯藤子,撵水桩,直到确信接下一年的,旧房子安全无虞,不会在他无法监管到的狂风暴雨中垮掉。还有茅房边他种下的毛竹,由春韭般的一小簇,已经发展成参天立地的偌大一蓬,他要沿圈砍掉一些送给隔壁槐如大伯做扁豆粽子,不然,竹枝迟早会戳到前面艾清家的屋顶。今年他砍竹子的时候,还在茅房顶上发现了一小窝逃逸分群的蜜蜂,里面有蜂王,他用旧衣裳将它们裹到三楼阳台下,专门找出一只木箱给它们安家。现在,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蜜蜂们正在阳光下绕着我们的房子嗡嗡营营。对,他由杂物间找来的木箱,红漆斑驳,改厨时舍不得扔掉,就是早年他结婚时,由母亲娘家陪嫁抬来的衣箱。

母亲也忙。村里老太太们“嵌五星”的麻将牌,“上大人”的纸牌,这些“召唤结构”已经期盼她有了一年了,我弟弟的远程指令是“只能输不能赢”。但母亲哪里肯轻易认输,总得有一周左右的比试,才能勉强接受功力荒废、技不如人的残酷现实。好在牌戏也是龙门阵,老太太们在淡定地赢钱的同时,也会将村子里的八卦一五一十地补课给母亲。母亲回到家,再转告父亲,这样他们两个,就可以将“我们村的新鲜事”同步更新一遍。

牌场竞技之外,母亲的社交活动也安排得很满。去姐姐、妹妹家做客,不然带回来的新外套,不就要锦衣夜行了吗?去肖港镇看望舅舅一家人,教舅舅用微信发语音,给舅舅演示她新学会的健身操与广场舞,嘱咐我在镇上开歌厅的表弟“走正道”,这大姐大的气场,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母亲还联系到了我外婆娘屋的一些表兄妹们,其中有一名叫双珍的表妹,公社时代的闺蜜,隔了近四十年后,她们又重新见面,两位七十开外的老太太手

风土记

拉手,眼神热烈、兴奋,还有一点紧张与羞怯,就是杜甫诗里面“少壮能几时,鬢发各已苍。访旧半为鬼,惊呼热中肠”场景的再现。

父母的长辈差不多都已谢世,只余一位母亲的姨妈,是外婆的小妹,嫁到我们村,住在村北,小时候我们叫她“北头姨婆”,父亲与母亲结婚,是她做的媒。她已经近九十岁,身体还硬朗。看望姨婆,是母亲社交活动的顶点。姨婆有养老补贴,不生病,花不完,所以坚决不要母亲给钱,母亲知道老人家爱吃蹄花,会清早去涂河集,买三四斤重的猪蹄膀,由父亲负责用刀剁好,清理干净,然后两个人一起送去姨婆家。这时候,父亲会脱掉他砍竹子搞蜂蜜的工作服,换上呢子外套,洗脸梳头,神情里就有一点女婿去见丈母娘的扭捏。姨婆之前做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,举手投足有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的气概,现在面容笑貌,是越来越像外婆了。外婆去世也有二十年,小脚,吃斋,不识字,晕车船,在世时,清明谷雨,父亲会用板车载着她,来我们家做客半个月。

如此此时此刻,跟随父母在乡间散步,并非容易。父母尚在,身体尚好,能远游归来,能有一点闲趣与兴头,这个是前提。

散步的概念,与广场舞一样,也是最近才由城市传递到乡村来的。村庄与田野之间的大路、小路、沟渠、田埂,来龙去脉,我们像自己的手掌一样熟悉,出门,回家,往返作息,行走在路上,肩挑手提,冲风冒雨,热汗淋漓,是去做事,来温饱。大概也是最近,我们才能将这些道路当成闲逛的场所,鼓腹而游,去聊天、养生与消食。

父亲与母亲是在南宁的小区里形成的“惯习”,眼下村里人晚饭后来散步的,三三两两的也不少,大概是肖港镇里传来的时尚吧。

我们遇到后头屋的聋子婆婆,一个人背着手,稍伸着脖子,往前走,与母亲比划着呀呀讲话,她大概可以盯着嘴唇读懂一些字词,自己发出来的声音,好像也越来越清楚了,她要母亲去她的菜园里摘菜,她种的土莴笋已经可以开园了。槐如大伯慢慢追上父亲,沉默地抽着烟,父亲戒烟好几年了,自然是要向大伯唠叨抽烟的危害,不久就将话题转向如何量血压,前几天他送了一支血压计给他的堂兄。大伯八十岁,目前是我们村辈分最高与年纪最长的男性,一周后我送父母回南宁,父亲降下车窗与槐如大伯告别,大伯站在他家门口的桂花树下抹眼泪。我还看到邻村肖家河的一位大姐,坐着轮椅与我们打照面,她已经认不出父亲与母亲了,但我认得她,小时候,我去初中学校读书,会由她家门前经过,她因为小儿麻痹症,常常望着水井旁边发呆,像孔乙己一样背着麻绳坐在一只稻草蒲团上。后来她得到了轮椅,现

序跋精粹

批评意味着对文本有话要说。这里的“文本”,指的是小说。就像老饕对吃进肚子里的美食回味、品评一样,小说爱好者也会对作品进行比较、参照和评判。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,什么是不好的小说,好在哪儿,坏在何处,读到心领神会时,将所得有理有据一一道来。在我看来,就是批评的雏形。

我写文学批评,源自对外国文学的喜好。十几年前,我在深圳大学念书,爱跑图书馆。当时新馆(“南馆”)未建,只有毗邻行政楼的旧馆(后改称“北馆”)。一楼的世界文学书架,是我时常流连和逡巡的。那一层铺着毡布地毯,因常年有人踩踏行走,早已变作黑色。世界文学按国别分类,一一排列浏览过去,琳琅满目。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光亮不够,望过去,给人一种置身昏暗洞穴的感觉。有一学期,我修一门外国文学课,循着老师开列的书单,找相应的作品来读。我记得“法国文学”那一排有套7卷本的《萨特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年),精装,封皮早就去掉了,整整齐齐排在底层,要俯下身才能看清印在书脊的书名。我读了“小说卷”的《恶心》《墙》《文字生涯》,“戏剧卷”的《死无葬身之地》,还有“文论卷”的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等。大多圆吞枣,一知半解,但总归是“读”了,过目了。待到听讲,有阅读打底,那些“文学概况”“思潮流派”“作品特色”,不再是抽

象而遥远的名词了。

二〇〇八年六月一个雨夜,我在宿舍楼自修室读完胡安·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(译林出版社,2007年),激动不已,连夜写了篇“读后感”,信马由缰,毫无章法,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

艾萨克·辛格认为,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卡夫卡,一个乔伊斯,一个博尔赫斯足够了,这些现代派作家穷尽了一切形态各异写作技巧,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即将山穷水尽时打开了一个通往坦途的大门。

辛格追求朴实无华的叙事方式,被誉为“当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大师”。然而,直至深入到鲁尔福的世界里,我才恍然,这个从萨拉约拉小镇走出来的墨西哥男人,远远凌越于辛格之上。

那段时间,我先读了余华的随笔集《我能否相信自己》(明天出版社,2007年)——里面提到艾萨克·辛格和胡安·鲁尔福,又读了马尔克斯对胡安·鲁尔福的简短追忆》(开篇的“发现胡安·鲁尔福,就像发现弗朗兹·卡夫卡一样”如同警句),再按图索骥,将辛格的《傻瓜吉姆佩尔》(余华有篇致敬辛格的小说叫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》)、胡安·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找来看。现在看来,上述论断未免过于偏颇、浅薄。但这是一种直观的阅读体会,它仰仗苏珊·桑塔格说的“感受力”,未经修饰,也没有道理论“侵蚀”,颇为可贵。

批评者应该保持对文本敏锐的感受和判断力。这和艺术直觉有关,也离不开大量的阅读。因为写小说的缘故,

戴胜鸟的田园

舒飞廉

在她手动的轮椅已换成电动的,沿着乡村新修的水泥路,可以毫不费力地回村去。我想,再过几年,外骨骼机器人的技术完全成熟后,这位大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乡间漫游了。

向西三五百步,走到十字路口,聋子婆婆与槐如大伯掉臂回村,我们三个折转向北,沿着汪寺公路继续朝前走。大路之西,澧河之滨,晚霞之下,沿着路下的沟渠展开的,是我们村一百多亩稻田,我们家的三四亩责任地,也在路边,方方正正,与其他的稻田一样,长满马鞭草与紫云英。稍远的澧河堤下,我一位远方堂兄保志,正开着他朋克十足的新拖拉机翻地,保志嫂站在不远处的田埂上,看样子是来催促他回家吃晚饭。保志的父亲外号“黑人”,生产队的时候,他管我们村的抽水机。现在,保志与保志嫂几乎接手了全村所有的水田,各自开着各种农机,宰田,上水,插秧,打药,收割,脱粒,这是从前全村两百多男女老少的活儿,他们两个打理得不慌不忙,只是晒得黧黑,真正是接下了槐人大伯的班。等等,保志哥黑炭一般倒也罢了,保志嫂从前可是垌里的一枝花啊。这些水稻田里长的粮食,养活了我們祖祖辈辈无数代人。父亲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四个在路边责任田的泥水里劳作的情形,还历历在目。清明谷雨办好事,立夏小满正栽秧,我插秧割谷,水平都远不如姐姐妹妹,水田里泥鳅鲫鱼不少,蚂蚱蚩蚩也很多,夏天雷雨,水田下沟渠里水流如箭,正好用小档网捉小鱼小虾,在小水桶里活蹦乱跳。

向北走一二千步,是匡埠村,母亲停下脚步,她已经听到了村口狗子的龇牙腹诽,一脸惊惶。我们转向东,再向南,沿着蔡家河与我们村田畝间的小路往回走。匡埠村正在请来挖土机大兴土木,他们想将村东一连串新月形的池塘清淤贯通,筑成一片花园。父亲说,这些池塘向南,一串串,断断续续连着蔡家河、郑家河、魏家河、官家河、涂家河,从前是澧河的旧河道。到底有多从前呢?父亲说他也是听祖辈讲的。柳宗元到南方,学到本地的词语,他写《永州铁炉步志》,说“江之浒,凡舟可摩而上下者曰步”,这个“步”,大概就是匡埠的“埠”;又写《袁家渴记》,说“楚越之间方言,谓水之反流者为‘渚’,音若‘衣褐’之‘褐’,大概也通蔡家河、郑家河的‘河’吧。所以由地名来看,我们耕作在周南汉东,澧水之滨,云梦泽陂,“子子孙孙无穷匮”,也有千百年,其间山陵倾覆,河流改道,也是有的。

我们村的墓地,就在这条旧河道东边,蔡家河与郑家河交壤的一片龟背地,当日应向向西俯看老澧河的一弯清流,再往东三十里,就是大别山的列列青峰。祖父祖母葬在其中,前几天我们来放了鞭炮,烧了纸钱,伐去了坟头的构树苗与坟间的野蔷薇藤。我们路过的时

候,惊起坟林枫树、构树与杉树间的鸟儿,麻雀、喜鹊、斑鸠,叽叽喳喳,翕动翅膀,又重归平静。

小路旁,纠缠的野豌豆丛中,还有不肯归巢的鸟儿,我认出来,是一对戴胜鸟。扇子一样的羽冠,船钉一样的长嘴巴,云霞一般灰棕色的羽翼间,还有白色的条纹,眼睛黑豆一般闪动,它们并不怕人,也不担心天黑,不紧不慢地走在田埂上,翻找草丛中的蚯蚓与蝗虫。它们不爱展开双翅高飞,用双爪走路还多些,来到庄子的《逍遥游》里,既不是斥鴳,也不算鲲鹏。这并不是在乡村第一次看见戴胜鸟,去年夏天路过殷家大湾,在村后

的河堤上,也看到过一对,它们好像遇到了兴高采烈的事,扑扑地叫着,颈部前倾,不停地点着头,头上的羽冠耸立怒发,有一点像公鸡的冠子。栋树兄跟我讲,在魏家河一段的小河堤上,他也遇见过一窝。可见它们各自是一对戴胜鸟夫妇,捉虫养育孩子,将家安在各种树洞或者河堤的穿土洞里。每一个戴胜鸟的巢,可能都被上天安排有一块巡视与作息的小小田园。这些年来,乡下的鸟,种类与数量都在变多,黑背喜鹊、乌鸦、大雁、白鹭、野鸭,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陌生的鸟儿,是前前我们的田野里没有的。我问母亲以前有没有看见过戴胜

笔会

天使在这里
化腐朽为神奇
(丙烯画)
纳尔吉斯·保利
[孟加拉]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

“非虚构”作品(评论随笔集),收文23篇(包括附录1篇,所有文章此前都发表过)。其中最早的起笔于二〇一五年,最迟的完成于二〇二一年,写作的地点散布在北京、广州、香港和美国,部分为约稿,更多是自发写作。每篇文章都力图对小说这门艺术有所发微、提出洞见,既成散论,又连缀一体。这些年来,我时常思考小说写作的“常识”(“小说是什么、怎么写”的经验、道理与知识等),这些思考除了见诸小说作品和“创作谈”,更多借助评论他人作品,在与形态各异的小说对峙、斡旋、协商中呈现出来。

书里批评和谈论的对象,有西方当代小说家(萨拉马戈、罗伯特·阿尔特、恩里克·比拉-马塔斯、裘帕·利希希、罗曼·拉什等),也有格非、余华、薛忆尧、麦家、阿乙、葛亮、张楚、赵松、张惠雯、郑小驴、孙一圣等备受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。此外是些谈论小说叙事和阅读的随笔。书籍共分五辑:“域外的声音”“诱人的风景”“小说的读法”“讲故事的传统”(两辑)，“附录”是和格非老师就《望春风》(“文本细读”)的有《距离、时间与沉默:现代小说叙事“三调”》和《诱人的风景:海外华文小说与“中国结”》两篇;“文本细读”的有《短篇小说的“理想”》一篇(据一次公开课讲稿改成,谈罗思·拉什的《艰难时世》);写人兼谈小说的,有《“远读”与“近读”中的格非》;“作家论”有《文坛小小说家及其创造——葛亮论》一篇;长篇小说的评论,有评《望春风》《人生海海》《“李尔王”与1979》《流俗地》的四篇……可以说,从六年间写下的几十篇批评里挑出心仪篇目,既是自我回顾,更是为了寻觅知音。

批评是批评者的通行证,是挤过窄门,开启文学漫游的人场券。

2022年1月22日,香港大学

本文为《小说的常识》(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)后记

我写了十几年的小说,这是第一部

的沉迷。再往后,是读博阶段——依旧在比较文学专业,不过做的是现代文学研究。因为长期浸淫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,本科时,我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不感冒,上课总干别的(考试前临时抱佛脚)。待到千辛万苦考上了博士,才发现自己有着明显的知识盲区,于是拼命补课——读海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(夏志清、李欧梵、王德威、安敏成、刘禾……),同时读现代文学经典(直到现在,也只读了很少一部分,一点点扭转和矫正治学取径。这就意味着必须摆脱旧有知识框架、思维方式和阅读趣味,是戴上“紧箍”、自我折磨的痛苦过程。一番摸索,逐渐找到门道,写了论《四世同堂》和晚清“教育小说”《苦学生》的文章。它们介于批评和研究之间,未免留有缝合小说与理论的生硬感(后来在《文学评论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发表的学术论文,不收进此书)。

写文学批评,也是从这个阶段正式开始。它们更似我在谨小慎微、循规蹈矩的论文(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赵树理研究)写作之余,一种和小说“短兵相接”“独抒己见”的文字。批评无须字字求出处,也不必与过去研究对话,因此可大胆舍弃文献陈述这一“规定动作”;它要摆脱学术腔,不写空话、套话、奉承话,尽量贴紧文本,谈最切要的问题。当然,这番概括是粗略的。理想的状态,是将会学问的严谨与批评直陈要

这段稍显绕口、晦涩的话出自伊格尔顿《批评与意识形态》(北京出版社,2021年)。我很喜欢“话语和现实之间的‘离析’都恰似同一事物的幽灵”的说法。批评不是单纯地为他人做嫁衣,而是为了提供条件“让文本了解自我”,也让读者了解文本。因此,批评更像一个“中介”,嫁接起作者/作品、批评者和读者的关系。写批评的人,化身成通灵师,施展法术,把附身在小说之内的幽灵召唤出来,让它开口说话。